

夫妻同心其利斷金 --- 知名女作家莫非背後的「他」

杜永浩口述

蘇文安、蔣吳蘊蘭採訪

蔣吳蘊蘭整理

當惠琬站在台上演講，我是聽眾，也得到幫助。身為配偶，我沒有「男應該怎樣，女應該怎樣」的心理障礙；鼓勵她作文字人，投入文字事奉。當初她父母反對，爸爸還特別來美阻止她，結果我說服了他：「你培養一個能作夢的女兒，請讓我來幫她圓夢。」

神奇妙的呼召

其實我早有呼召。高中時在冬令會聽到戴紹曾牧師問「中國人，你在那裡？」就回應奉獻。大一時，有一位天主教神父(是研究歷史的教授)挑戰我們：假如「孤蘇城外寒山寺」裡的「寒山寺」變成「天主堂」會怎樣？這些名詞後面代表了甚麼？文化累積帶來甚麼意義？原來基督教精神在中國文化裡還沒有真正扎根！當時神就把這負擔放在我心中。今日回頭一看才知道神的意思。

對於獻身作傳道人，我有兩大障礙：(1) 原生家庭窮苦，生存最重要。(2) 基督教對中國人帶來某些「不良影響」。譬如我高三信主後第一個農曆新年，新衣新帽到牧師家拜年，他臉上的表情很錯愕，不曉得如何回應。中國基督徒被要求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現象，對我震撼很大，以致開始對宣教士及牧師很有意見。到底基督徒在生活各層面裡，應如何看中國和西方文化？

日後到美國念研究所，畢業後到加州找工作認識惠琬，當時我的兩個障礙還在。後來她投一篇文章，被《使者》退稿，但被蘇文峰牧師邀請參加《華神》的文字事奉課。不料，她在課堂接受神的呼召，願意成為全時間文字傳道人。

漸進的文字事奉

第一階段，惠琬用十年時間裝備自己，包括念神學院和學習怎樣寫。她迷上中國文化及文字之美，大量購書，充實自己。頭一兩年我幫她改錯字，心裡想：「不懂中文，可以寫嗎？」卻親眼看到「神揀選愚拙人」的奇蹟。她執著而且努力，重新用小留學生角度解釋傳統中國文化，深深影響了我。

第二階段，惠琬開始在各領域得獎，從佳作到第一名。此外，因寫作發表，她有機會開始演講。當時我在教會服事，也在宇宙光幫忙，夫婦與林治平教授很熟，他鼓勵惠琬投稿，在宇宙光開專欄，並成為終生的作者。我被呼召獻身時，沒有正式的事奉崗位，但不管神放我在那裡，都忠心地服事。回頭看到神的帶領，越來越清楚神的安排。

第三階段，大概是 1995 年，那時我們已經認識很多文字創作人。一次宇宙光聚會後，我作調查，看看他們對這種聚會有多少興趣。結果回應很熱烈，最後決定每季聚會一次，大家分擔費用，自給自足。不成立正式機構，沒有正式組織，好像是打游擊戰，就這樣以團契的方式運作了十年。

第四階段，大家對團契不太滿足，有危機感，因為團契裡熱情的人慢慢地減少。當時蘇文安牧師與惠琬已經在東岸 KRC 教了十年，惠琬有感動在西岸也辦一個營會，後來決定正式開辦書苑。成立非牟利機構，劉哲沛律師夫婦成為我們的法律顧問，是神很大的禮物。沒有辦公室，團隊常常人手短缺，但主的恩典夠用。求神差派半職或全職的同工，有固定的人作事。

家庭事奉的反思

交往一年後訂婚，再一年後結婚，二人世界很快過去。第一個小孩，生下來四磅，不吃東西，我們被醫生罵；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關心說我們不餵她。惠琬曾寫過一篇文章說：「剖腹生產的傷口是好了，可是心中的傷口卻是永久的。」很可以說明我們那時的無奈。兩年後又生一個小孩，每個階段都有挑戰。後來惠琬開始寫文章，辭去顧問工作，當時她在休斯飛機公司做系統設計的工作，薪水很高，但為服事毅然獻身。轉眼兩個孩子長大，結婚已二十四年，家中從未因她辭職而有缺乏過。

孩子小時候，夫妻要學習達到服事和家庭的平衡。例如從前家中有小組，晚上七點半開始聚會有人九點多才到，十一點多弟兄姊妹離開後還要收拾到半夜才能休息。有一次小孩生病氣喘，我們卻很晚才能帶孩子看急診，心裡很不平衡，說：「不能再在家中聚會了。」

惠琬作文字工人，我支持她的心有時難免有起伏。偶而夫妻吵架說氣話不支持，她反應很激烈；想到她很看重我的支持，我就氣消讓步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只是講氣話。」我倆都是老么，意見不同通常是她先道歉，口頭我上不常道歉，但是會以行動表示。

對工人配偶的建議

無論在家庭、在教會、在機構都是對「人」的服事，這並非我的強項，所以一直在學功課。惠琬敏銳、細心、有先知恩賜。我處變不驚、大而化之。我在前面衝，她在後面補。個性上，她是悲觀者，我是樂觀者，我倆配合本來可能是大凶，但到如今靠主恩典卻是大吉。與同工配搭，其實每個人都要學自己的功課，要讓別人按他們的時間成長。

《創文》同學當中有很鼓勵他們學習的配偶，這是個福氣。以後寫出來，更需要配偶的支持；太太要先生，先生也要太太在背後支持。表面上是我支持惠琬，其實很大部份是她在支持我。她說的話，她寫的書，都是在建造我，這是良性的互動。無論我們作甚麼，最基本的是夫妻好好溝通，加深了解，相依相重。

還記得新婚在夏威夷爬到火山口，躺下來，睡著了。後來彷彿聽到叫救命的聲音，惠琬緊張得跳起來。當時霧非常濃厚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才發現她平常柔順驕弱，其實很勇敢。有一次坐飛機我頭昏，她像媽媽般關心我。在羅省青年團契事奉，我要選團長，制度非常嚴，我被檢查審視。回家後，她問我怎樣，我說沒什麼；她看出我有委屈，哭起來，打電話給主辦人，她真是很懂我。

回想前十年的心態，我像是在後方，很不警醒；當惠琬被邀作不同退修會的講員，我想趁機帶孩子去玩一下。結果，對她有很大的影響，因為她還要顧及我們的衣食住行，不能全心在事奉上，在這方面我學習很多。

《創文》的異象和回顧檢討

文人很孤單，雖寫了文章，但不知讀者在那裡；很寂寞，傷亡率也很高。惠琬和我一步步在愛中一同學習，最初異象是聚集同路人，支持鼓勵大家走下去。十年後發覺這很重要但還不夠，還必須幫助、裝備、訓練和連結文字事工的弟兄姊妹。

正式訓練文字精兵有神的心意和時間，例如保羅去歐洲，以致歐洲文化深受基督教影響。這時代的華文出版和教育都萎縮，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字越來越不重視，是個荒涼的時代。然而，我們若全力以赴，相信過不了太久，就有果效。抓緊文化和文藝創作的時機和契機，讓基督的信仰在中國文化裡融合，在荒年時委身撒種，將來才能發芽。

蘇文安牧師、鍾越娜老師和惠琬大可以只一直寫，但他們更願意訓練下一代。林治平教授說文字工作是在翻土，把土壤變好；邱清泰博士說《家新》是作高跟鞋的工作，一個點下去；《創文》聚焦於訓練文字工人。

在機構一陣子，一路走來遇到貴人，很感人。例如在開辦《創文》前去拜訪神學院，包括《正道》的劉富理牧師、《華神》的梁潔瓊院長、《真道》的張繼忠牧師、還有《國際》的唐崇懷牧師，雖然神學院基本上所注重的是神學，他們都提供很好的建議和幫助。當時唐院長給我的印象很深，他快要退出《國際》，雖忙卻仍關心鼓勵；他認同文字的重要，並介紹國內文人讓我們接觸，對文人來說真是知音。

分工方面，老師們教導訓練是第一優先。惠琬是機構的領袖，對外代表《創文》。我在幕後支持她，是總幹事，負責行政工作。我有職業，全職上班，幸好一年有五個禮拜的假期，我休假來服事，服事就是休假。有人曾說夫妻在同一個機構不太好，也有人說這掛慮是世界作事的評論。但人是軟弱的，「有半職或全職的同工比較好」是很好的提醒，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，深信主的恩典夠用。